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碎片——一个右派妻子的文革记忆	谢文秀
【不堪回首】	“文革”这出戏票价太贵	黄永玉
【研究述评】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三）	杨 隼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碎片——一个右派妻子的文革记忆

• 谢文秀 •

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皱纹爬上眼角，双鬓飞霜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

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梦幻的是实实在在右派妻子的处境。比起那些随丈夫发配到边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淡淡的”，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从没离开原先工作的新闻单位，下放过几次，也是名正言顺的下放干部，不算劳改。

幸耶？不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从没有挨饿受冻，更没受过批斗，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强烈地震时甩出的揉着惊悚、辛酸、无奈也还带着一丝温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脑海里，化不开，忘不了。

◇ 冬日

三十多年前的冬天——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

我住一间朝北的小屋，暖气似有若无，隔夜烤在暖气上的袜子没干。我又给孩子们找出两双袜子，一双有个小洞，赶紧找针线缝上。

每星期一早上都是这么紧张。不到五点半就起床，自己收拾停当，给两个孩子准备好干净衣服，轻轻地叫醒儿子、女儿。

闹闹、甜甜，乖，起床，该上幼儿园了。

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了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里，天还没全亮。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唯一的一个。天还没全亮，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上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都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睛一酸，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启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 离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守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更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邵燕祥是摘帽右派、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峭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拚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公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燕祥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的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

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吗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 要强

我自以为是个要强的人。

那一阵工作、开会、学习，哪头也不敢耽误。“文革”开始刚兴背“老三篇”时，我和同办公室同龄的张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的人（不说你反动就是十分客气的了），其实是从来不甘也不敢“落后”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开场合我不愿失态。1957年我跟他同一个部门，批他的大会、小会，凡是让我参加的，我都不动声色坐在一旁，听着各种上纲上线的批判，瞥一眼各种人投来的目光：幸灾乐祸，冷淡，更多的却是同情。这次运动来势更猛，下跪、剃阴阳头这些至少在电台前所未闻的侮辱人格的种种，他无一幸免。

那天早上，我一进广播局大门，就感到异样，几个年轻人恶狠狠地嚷嚷，把黑帮梅益揪出来！接着中央电台有人呼应，把郑佳揪出来！又有人喊，把……我赶紧快步走到办公室坐在桌前，不管走廊里有什么动静，我总是一声不吭，低头编稿，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安。我认出门口的年轻人中有一个是广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是对外部（国际电台）的文艺编辑，总还会有对内部（中央电台）的人参加，都是些谁呢？事后听说把黑帮头发剃成阴阳头的是六十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曾跟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过；那个特地找来剪刀的我还比较熟悉，是个极为幼稚的小录音员。应该说在广播局当时的一帮风云人物中，他们绝对不算最坏，可是偏偏我认为人品还算过得去的人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真是不可思议。事后想起来，觉得运动一来，那种疯狂，那种“斗、斗、斗”的氛围，还有历次运动过后积极分子被提拔的实惠，真是把人性中最最丑恶、最最残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调动出来了。这几十年，我还多次遇到那位复旦的低我好几班的校友和那位录音员，我们相处很好，谁也不提当年那些个事。

那些年在公众场合，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总是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委屈、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每天上班，特地穿得整整齐齐，个别极熟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说，你啊，越是日子不好过越穿得笔挺。笔挺显然是夸张，不过确实不愿给人以可怜兮兮的印象。

1967年女儿转进广播局幼儿园，周末、周一早上不用兵分两路，疲于奔命，我感到轻松多了。运动一开始那种焦急、畏惧的情绪也稍有减轻。

两个孩子诞生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高兴时给孩子缝点衣服，偶尔回上海，亲人送、自己买，孩子穿得不算差。“文革”开始后，孩子长高了，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到商店看看，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个兜的中山装，价钱又不便宜。我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吧。平时开夜车怕影响第二天工作，万一犯困出了差错，可担当不起。星期六晚上孩子们睡下后就是我做针线活的时间，缝纫机经常踩到半夜两三点。会缝纫的大姐也曾给孩子做几件夹克衫寄来。哥哥和二姐也没忘了给我两个孩子买几件童装。就这么着，儿子从小到成年没穿过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装。我还记得，女儿有一件浅蓝色灯心绒外套，又短又小，我把它改成一件后边开的背心，还镶了深蓝的边，她穿了好几年。可能是1969年，形势稍许缓和一些，上海的哥哥出差来京特地为女儿带来了当时最时兴的小军装，女儿挺喜欢，我始终没让她穿，转送出去了。铺天盖地的草绿色，我不只是看烦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得意洋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头的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人的红卫兵，成天绷着脸训斥人的军宣队，哪个都穿着一身绿。

以往节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奶奶家去不成，我就设法带他们上公园，让他们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样，有欢乐的童年。

“文革”开始一两年，我还参加节日报道或重大报道的最后复制合成工作，外出采访自然就免了。复制合成时间性强，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好在这些活我干了多年，并不怵，麻烦的是晚上播出后还不算完，必须等姚文元审定的新华社稿来了以后，以钦定稿为准修改。这样，“五一”“十一”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着工作。改完还不能走，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一个改稿呢，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人民日报》大样，我才算完成任务。

在机房时，我尽可能镇静、细心，动作敏捷，除了眼前的录音带、文字稿，什么都不想。出了机房，有点空闲，就要想这想那，想起那一双没人接的儿女，该在幼儿园园长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老安伯伯是位老红军，文化水平不高，心眼儿好。每逢节假日谁家孩子没人接，他理所当然地把孩子安顿在自家。我那一儿一女是老安家节假日的常客。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弯曲的身躯，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次我从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谢意，他和老伴只是轻轻地说，孩子挺好，快走吧，带孩子好好玩玩。

是的，那天我上幼儿园接孩子已经是5月2日早上快八点了。3日一早，他们又该回幼儿园过集体生活，这仅有的一天，不能委屈孩子。“走，咱们上北海公园去！”两个孩子一边跳着蹦着，一边抢着告诉我头天夜晚怎样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顶上看天安门放花。虽说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看孩子们这么兴奋，倒也不觉得困乏。“真好看，妈妈，轰一下，半边天全亮了，紫的、黄的、银色的，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你们怎么上的房？可要小心啊！”“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大姐姐把我们弄上去的。没事的。”

节日夜晚看放花，北京人得天独厚的享受、乐趣，对我仿佛已经陌生了。1956年的国庆，燕祥要写一篇夜晚的特写，我陪他走在西长安街上，望着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我们随便谈着，他说起火树银花，我忽然联想到在上海看过的美国歌舞片《火树银花》，不过没好意思说出口，当时他正真诚地帮助单纯得近乎幼稚的我，多读苏联的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时看过的美国电影呢！我一直觉得他比我革命得多，甚至认为他过于刻板，不会跳舞、不会打桥牌，不会……我做梦也没想到，才一年时间，这个温文尔雅的共产党员被批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唉，越想越远，想哪儿了。

忘了哪一年，可能是1967年，六一儿童节正赶上星期日，我们三人起了个早儿，到颐和园门口才七点。清晨的公园空气分外新鲜，我带着他们登万寿山，游昆明湖，照了几张相。兄妹俩有两张单人相片后来放大了：在十七孔桥上，哥哥的那张笑容有点尴尬，是硬逗出来的，妹妹倒是抱紧了斜挎的军用水壶，乐开了花。谁能猜到这是一对享受不到父爱的孩子！

第二天上班，说起头天的活动，同事说我真是好兴致，精气神儿足。我也不知道那几年哪来的劲，过三十的人，又不是多好的身体，不说是身心交瘁也是勉为其难，居然顶下来了。人，大概就靠绷着一股劲儿，松不得，软不得。

◇ 闹钟

1968年初，儿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学上学。

一直到临开学我才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他所在班的孩子春节前就走空了，老师知道我家没人照应，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帮着小弟弟、小妹妹系鞋带，叠被子，就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

学校开学了。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八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六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八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

“不，我等妈妈。”

“八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十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疼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我们娘儿仨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单元和中间单元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多。

白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滴答滴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作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我在五屉柜抽屉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 姥姥

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班上有位工人师傅挡着不时飘来的凄风冷雨，邻居姥姥的爱心又使我一进单元门就感到人间的温情。

姥姥姓高，随着女儿女婿住。我们共住两居室的单元房。姥姥来时就住厨房，小夫妻带着孩子住朝阳稍大的屋，我住朝北的小屋。做饭的两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窄窄的过道里。

姥姥是徐州人，勤快，大脚，有把力气。一次我提着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楼，正一步一步往上挪，她见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噤噤一气儿到四楼，弄得我惭愧不已。她认字不多，可明白事理，热诚，擅长做面食：擀饺子皮、馄饨皮，蒸馒头包子都是能手。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饼，那明快、麻利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烙薄饼不用煤炉，走廊里临时用柴禾架起鏊子，右边放着面板，她边擀面，边添柴，掌握火候，烙完一张，用擀面棍轻轻一挑，白白的饼就飞到了另一旁的筐箩里。她看我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勉强会焖饭炒菜，什么面食都不会做，想换换口味，只能上食堂买，说这太浪费。她教我干这干那。我跟她学会花两毛钱买肉馅包馄饨，秋天大白菜便宜，稍稍放点肉末或油渣蒸大馅包子。连闹闹都学会了擀饺子皮、馄饨皮。高姥姥戴着花镜，跟我学会用缝纫机。

可能是19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还没全黑，我正在班上开会，忽然天气骤变，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办公室有孩子的无不惦念着，尤其是汪玉芝和我。不久前汪爱人所在的地质学院外迁，她跟我一样，一人带着孩子。随着一阵阵雹子噼啪落地，楼里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哗啦啦散落到院儿里。这么大响动丝毫改变不了会议的进程，真是雷打不动。我们虽然坐立不安揪着心，也不敢请假。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一出门就觉得像深秋季节，凉飕飕，地面上铺满了没化开的大小冰雹。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才进大院儿，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茬站那儿，穿得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小女孩见到汪玉芝，委屈得都快哭了，“妈妈，妈妈，我害怕。”我，顾不得安慰这母女俩，赶紧回去。往常这时候孩子们该睡了，这天他们和邻居的小男孩儿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兴。闹闹毕竟大些，有条有理地告诉我，朝南的大房间有块玻璃碎了，已经用硬板纸挡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时候，高姥姥担心我和妹妹害怕，让我们到大屋呆着。孩子们说：人多不害怕。一场冰雹，我的一儿一女安然度过，而汪玉芝的女儿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部门安排人参加“拉练”。当时工宣队已经撤了，仍然是那位支部书记说了算。不明白为什么，先后派两人去，偏偏是汪与我。如果说我因出言不慎应该付出些代价，汪可是无辜的。她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毕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除了淘气的外孙，又添了个小外孙女，我把食堂饭票、零用钱都交给闹闹，让他带着妹妹到食堂吃饭，按时睡觉，尽可能自力更生。“拉练”回广播局那一天我疲惫不堪，想不到还没进机关大门，远远就看见高姥姥领着兄妹俩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回来？”孩子们回答：姥姥打听来的。一泓暖情，不，是亲情，涌上我的心头。

著名的单弦演员马增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文革”时他们两夫妇受到不小冲击，政治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风暴稍一平静，他们没少帮我。他们也是两个孩子，大女儿谢艺是五十年代生的，比我儿女都大，儿子谢东年岁跟甜甜差不多。闹闹上学后，甜甜还在广播局幼儿园，班车一到，我经常不能准时去，马增蕙骑车，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把我女儿一起接到他们家，谢艺先陪着玩。多少年了，孩子们还记得马增蕙阿姨，谢凌霄伯伯，还有谢艺姐姐。当年的小顽皮谢东，从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数不清多少好人关心过我们。广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认为燕祥会是什么敌人，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几年，他不少日子被隔离或挨批斗，但是锅炉房的工人、清洁工、司机经常转告他和孩子的情况。女儿猩红热后疖子长到耳朵眼儿里他知道，儿子上学功课不错他也知道。我的一动一静无不在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现在偶尔在机关见面，他们还惦着他：有的叫他诗人，有的管他叫“干部”，有的仍然称他小邵。

大约是在干校的时候，我在电台收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来信，是位女同学，但笔迹刚劲，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这封信被拆过。广播局收发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他们从不干这类事，偶尔信件错转到听众来信组被拆，退回时必注明。想来想去可能是有人出于对他的关怀，惟恐我有“外心”。时过境迁之后，提起这事，他也这么看，开玩笑说：“他们替我监视你哪！”

□ 摘自《收获》2006年第1期《亲历历史》专栏

~~~~~

### 【不堪回首】

“文革”这出戏票价太贵

• 黄永玉 •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当年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也好，“地煞”也罢，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 “顶住啊，老头！”

苦禅先生当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70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也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却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我有一个学生，他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裤子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却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他被命令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提要他说得出话。

我心里向着他，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但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给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人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他发抖的手总是将一个馒头掰得一大一小，而且相差悬殊，这当然又挨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用断锯条给他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

我一口应允。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

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当年“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革”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光荣户，永远到湖北农村落户生根。走前校门口还敲锣打鼓地，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 “气得要死，也哭得要死”

“文革”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文革”末期，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都被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那一场浅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

我们的劳动地点在16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大家就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32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70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农闲之余，我经常与杨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我和先让便到他的班上去看望，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儿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杨先让侨居韩国的爹，气得杨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

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

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儿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

“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于是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

“文革”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出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那是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 来源：微信号《口鸟》

~~~~~

【研究述评】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三）

• 杨 隽 •

（上接 z k 2 0 0 7 b）

三、概念辩证：干部子弟（女）、老红卫兵及分野

干部子弟（女）似乎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很多研究并没有去做到辨别，故而，很容易使人顾名思义，以为干部子弟（女）就是干部的小孩，凡是父母属于干部编制的学生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就可以填写“革干”（127）“革军”（128）或“革烈”。（129）

也契合了当时的宣传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即干部子弟（女）是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其中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女儿。（130）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不是如此，干部子弟（女）有着其特定的意指。据山东实验中学的学生回忆说：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在解释出身填表时就说“革干”不能随便填写，只有像该校校长一样的干部才可以算是“革干”。（131）而又据王绍光（132）说“在北京中央各部，十六、七级的干部可以视为‘群众’，但到一个县里，十六、七级的干部可以成为本县头号当权派。”（133）著名媒体人、当时在北京上学的马鼎盛也回忆说：“家庭出身，在育才学校（134）绝对讲究。1949年之前参加党的工作的，才叫革命干部。这种家庭子弟，能上育才学校的也是凤毛麟角。1938年参加革命的，叫‘三八式干部’，也算最基本的‘消费’。抗战前的老红军家庭，算是拿得出手。省级、中央部级、大军区级的高干子弟，校园中比比皆是。”（135）王友琴则点明了“革命干部”的真实含义，她指出“革命干部”一开始的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1949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她还列举了清华附中的例子，说“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并引述了一位受访者的话：“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136）吴洵和妮娜也点出了干部子弟（女）的实质就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文革以前，高级干部通常指十三级（司局级）以上的干部。”（137）故而，在本论文中，干部子弟（女）其实就是“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子女”，这些人一般来说，当时都还在中学。

但是，干部子弟（女）并不一定会加入老红卫兵，比如师大一附中的何方方与陈永康，甚至不一定愿意加入红卫兵，比如八中的陈小鲁和四中的孔丹，也不一定拥护血统论，如张郎郎，尽管老红卫兵一定会是由干部子弟（女）组成，而且是中学的干部子弟（女）。也就是说，老红卫兵的范畴比干部子弟（女）更狭窄。那么什么是老红卫兵呢？在当时还有一种老红卫兵，比如在八一八接见时周恩来就说：“我是个老‘红卫兵’。你们听从指挥，坐好。等会儿，毛主席来和你们照相！”，“老‘红卫兵’带着小‘红卫兵’，一齐干革命。”（138）又比如刘志坚接见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时说“昨天在天安门我带了一个红袖章，也成了一个老红卫兵”。（139）很显然，这种语境下的“老红卫兵”跟红卫兵运动中广为流行的“老红卫兵”不是一个概念，这里的“老红卫兵”主要指的是年纪大，和“小”是一对反义词。老红卫兵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目前，除去前文提到的陈佩华和印红标外，徐友渔将老红卫兵定义为“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成员当然是‘红五类’，核心为干部子女。”，苏采青则定义为“最初的一批红卫兵组织。他们在运动中于8月份一哄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颇有不同，与红卫兵运动结束后，直到1978年8月前，在中学生中保持的那种红卫兵组织，更是不同，因而又称他们为老红卫兵，以示区别”。

（140）可以看出，陈佩华、徐友渔和苏采青在两点上与印红标相当不一样：一、时间上不同，陈、徐和苏都将老红卫兵定义为最初或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其中，苏采青给出了一个很严格的时间范畴，即八月份以前。而印红标则是放到了只要是八一八接见之前成立的就算是老红卫兵，也没有附加上“最初”或“最早”之类的条件；二、陈佩华、徐友渔和苏采青都倾向于认为是“老红卫兵”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印红标则是自称，是特意要和“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相区别。

印红标的说法更受老红卫兵的支持，比如清华附中的卜伟华就将老红卫兵定义为“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一种通俗的称谓，也称作‘老兵’”。（141）又比如原东纠成员方广胜、方新阳兄弟认为老红卫兵指的是“毛主席‘8·18’戴上

三字红卫兵袖章前，成立的早期红卫兵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第二个是北大附中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142）有回忆也支持了印红标的定义，比如北京二十五中东纠成员白克刚的哥哥白克明（143）在1967年的一次远足中就问同行的二十五中红卫兵刘力：“红卫兵、四四派、四三派是怎么回事？”而刘力的回答则是：“红卫兵、四四派、四三派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中学生的三派组织，他们因文革而兴起，他们也必将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落幕……”（144）双方都没有称老红卫兵的意思。但是，印红标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正确，因为，8月1日毛泽东首肯红卫兵组织之前，北京的中学里红卫兵组织是少数，将所有的自发性质的学生组织都一概纳入红卫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忽略了红卫兵名称在中学干部子弟中扩散的过程。（145）而在8月1日之后，8月18日接见之前，北京的大学里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146）这些红卫兵组织显然并不属于老红卫兵。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本文修改印红标的定义，将北京的老红卫兵定义为“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中学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基本由干部子弟构成，鼓吹血统论”，但在论述上将老红卫兵分成两个群体，（147）即保守翼和激进翼，（148）其中保守翼是成立于8月1日到8月18日之间，更偏向于保守派，或者说其就是保守派的前身，基本不存在造反的任何特征，而激进翼则是最早成立的那批红卫兵，在8月1日之前就已经存在，还带有一些造反的特征，比如反抗中央文革的压制。这样的定义和论述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因为北京的老红卫兵从来没有统一组织统一行动过。

注释：

1 魏昂德（又译作华德或安德鲁·维尔德 Andrew G·Walder）特别指出动员问题不是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核心问题。见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4。

2 John Israel, *The Red Guar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30, April-June 1967, pp. 26-32。

3 下载地址见 <https://archive.org/details/POL0-CIA>。

4 李洁明著，林添贵译：《李洁明回忆录——美、中、台三角关系大揭秘》，台北，时报文化社，2003年1月，页109—110。

5 高雨莘：《哈佛文革专家评当年毛主席与今日习主席（下）》，2016年4月28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428/cc28macfarquhar2/>，2017年5月15日。

6 据李鸿永在1975年5月的统计，美国大学所藏的红卫兵资料共有2100种之多，含小册子、传单、小报等，时间跨度是从1966年8月21日到1970年2月，其中，按小报出版地排名，前四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和新疆，北京小报有207种740期，广东有218种426期，上海有32种72期，新疆有21种56期。参见 Hong Yung Lee, *Utility and Limita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 as Source Publication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4, No.3 (May, 1975), pp. 779-793。

7 （美）薛龙著，路克利译，陈松校：《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新星出版社，2012年，页13。

8 比如1966年12月经香港到台湾的黑龙江红卫兵王朝天（本名季水生），王朝天可能也是第一个广为外界所知的外逃红卫兵，他还携带了一些红卫兵资料。参见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出版新闻短片：《红卫兵王朝天投奔自由》，1966年12月17日—28日，<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1/9f/d5.html>，2017年5月15日。

9 比如骆思典 (Stanley Rosen) 博士论文的助手就是广州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头。见包淳亮:《骆思典 (Stanley Rosen) 访谈》, 2011年3月24日,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2017年5月15日。

10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2期。

11 Unger Jonatha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 2007, pp. 109.

12 在中国大陆 Anita Chan 又常被翻译成“阿妮达·陈”,但其实陈佩华生长于香港,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13 他们的主要著作有: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2.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14 参见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 1975), pp. 645-683.

15 参见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pp. 390-406. 及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 1980), pp. 397-446.

16 但是, 骆思典并非不涉及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 他专辟一章用近百页的篇幅描述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见 Rosen Stanle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in China 1960-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issertation, 1979, pp. 150-239.

17 比如陈佩华就基本认同中国大陆部分民间研究者所提出的“人民文革论”, 但其他的研究者则未必认同。

18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2期。

19 骆思典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特意提到了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他认为老红卫兵 (他在博士论文里用的是 *the children of cadre origin at middle schools* 一词) 对工作组的“造反”是暂时的, 仅仅就是那么一段很短的时期, 不能被认为是造反派。(原文为 *The children of cadre origin at middle schools rebelling against the work team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Rebels" in our account because their "rebellion" at this early stage was only temporary.*) 参见 Rosen Stanle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in China, 1960-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issertation, 1979, pp. 134.

20 陈佩华也提到了这一点, 大学中的派系分野并不是因血统论和阶级路线而划分。参见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 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台湾新北市, 2011年, 页204-214。英文版 (*Children of Mao*) 出版于1985年。

21 骆思典已经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指出大学生分派是依据工作组及文革的目标问题, 比中学生分派要早, 中学生分派则是在八九月间的血统论之争, 他还特地指出北京的情况也

是如此。见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pp. 397-398.

2 2 骆思典的解释是大学生已经成功的跨越了高考这道门槛，中学里的阶级路线已经没有办法对他们施加影响了，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保证分配，所以，大学生分派跟中学生分派不同。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了。见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pp. 398.

2 3 又译为吉斯·佛斯特。

2 4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昨天》，2012年8月30日第8期，<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2012%E5%B9%B4-8%E6%9C%88-30%E6%97%A5%E7%AC%AC-8%E6%9C%9F.pdf>。

2 5 林伟然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对社会冲突论的批判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参见林伟然著，李玉华译：《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出版年份不详，页9—15。

2 6 徐友渔曾提到1994年陈佩华、安德佳夫妇来华作政治学课题，他在北京光华饭店与他们见面，曾提及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关于“文革”的研讨会。陈佩华说，要开会，筹款倒有办法，问题是没有新东西好讲，枉自浪费时间和精力。徐友渔事后细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就拿对于红卫兵的研究来说，我们有多少东西超过了他们在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水平呢？老实说，许多人现在可以写出点东西，无非是仗着不知道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胆大。徐友渔著：《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版，页280—281。

2 7 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是 Andrew G. Walder,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May, 2002), pp. 437-471 及 Andrew G. Walder,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3 (Nov. 2006): 710-750。

2 8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9 An Introduction。

2 9 社会冲突论者对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义是造反派的矛头通常向上，攻击的是整个政治体制，而保守派的则矛头向下，倾向于保护整个政治体制，即使攻击领导，那也是这个领导已经被抛出倒台了，见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2, pp. 95-96。

3 0 魏昂德似乎是英语学界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 old red guard 的学者，但是正文中的 old red guard 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上的老红卫兵，自然就更谈不上给其定义了。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9, pp. 158。

3 1 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9, Chap. 7。

3 2 笔者目前查到只有王希哲于2006年认为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然而王的这个看法似乎更是政治宣言，而不是历史事实。他的原话是“那么若问，联动，林立果们也可以算是造反派吗？为什么不算？造毛泽东的反，不是造反派，还有谁敢说自己是造反派？非要蒯大富是造反派？王洪文是造反派？不发生转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派宁有种乎？也讲血统？昨天如何不论，今天造反，今天就是造反派！”见王希哲：《文化大革命十批判书（纪念文革40周年）》，2006年6月7日，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70502.shtml>, 2017年5月22日。

33 Felix Wemheuer, *Grassroot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aradigm*, published on August 26, 2016, <https://networks.h-net.org/node/3544/discussions/141257/transcript-grassroots-factionalism-china%E2%80%99s-cultural-revolution>, May 22, 2017。

34 安舟也不是社会冲突论者，但是其提出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及其论述框架基本没有超越社会冲突论的基本概念和框架。

35 这篇论文可能是英语学界第一篇提及老红卫兵的论文，但是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对老红卫兵进行定义。见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31, No.4 (Aug., 2002), pp. 463-519。

36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31, No.4 (Aug., 2002), pp. 479-481。

37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王绍光称群众运动中的“分派”是文革中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西方文革研究者来发现，只有没有经历文革的人才视之为“发现”，这种说法是种带着“民族自尊心”的虚骄，和学术批评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仔细看过社会冲突论的著作和论文都不会得出社会冲突论是为了“发现分派”这种说法。参见王绍光：《文革“故事”从何说起？兼答陈佩华的批评》，《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39 这些学者中包括西方文革研究学界的新秀吴一庆 (Yiching Wu) 等人。

40 在2006年时，宋永毅介绍了当时海外文革研究的基本现状，称美国汉学界对文革研究有三句话：“对历史学来说太年轻，文革时间不远才四十年，西方史学界更愿意研究先秦、老子等等。作为政治学来说，又太老；不如乡村研究、选举问题、金融改革等，这些项目在美国很容易获得资源。作为社会学，缺少必要的信息。”参见《动向》杂志：《宋永毅谈文革研究新动向》，2006年3月号，

http://blog.boxun.com/hero/wuys/51_1.shtml, 2017年5月23日。

41 我在这里对中国的定义是“以中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学者，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中国人，无一例外的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尽管他们的国籍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了。

42 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二十一世纪》总第31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10月。

43 韩钢曾提及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虽然他并未对“民间研究”下定义，也只是列举了沈志华一人作为民间学者的代表，但是，我认为他的提法是很正确的，的确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主流范式之外的研究。在这里的我对文革“民间研究”所下的定义是区别于主流官方文革观点，独立但又不绝对和官方观点对立的研究，不包括十年文革期间的官方主流观点，虽然这个“官方”是被现今的主流所否定的。不以在朝或在野划分。需知，很多不在体制内的人士自觉或不自觉的就接受了“两个”官方的观点，如乌有之乡。韩钢：《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6日，第八版。

44 著名学者邢小群将1996年即文革爆发30周年定为官方态度的转折点。从此，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至于，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她认为是“一是因为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

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思考的触角已经伸向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见邢小群：《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2016年4月30日，<http://mingpaomonthly.com/%E6%95%8F%E6%84%9F%E7%9A%84%E6%96%87%E9%9D%A9%E4%BA%94%E5%8D%81%E5%91%A8%E5%B9%B4%E3%80%80%E5%BC%88%E9%82%A2%E5%B0%8F%E7%BE%A4%E5%BC%89/>，2017年5月27日。

4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88/4854598.html>，2017年5月23日。

46 还有一篇略微不那么典型的则是关海庭的《红卫兵运动始末》，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五十六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14—138。

47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座》，内部出版，1987年8月，页172—190。

48 我曾以为“何为”是米鹤都先生的笔名，后询问米先生，米先生表示自己从未写过《老“红卫兵”叙评》一文，并指“何为”或许是何维凌的笔名。可能此事还要再询问《知识分子》的主编梁恒（索罗斯高徒，《革命之子》的作者）和宦国苍之后才能有最后的答案。

49 此文后来又以《红卫兵运动的源流》为名发表在团中央的《当代青年研究》上并收入于辉的《红卫兵秘录》一书，参见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及于辉编著：《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页333—348。

50 比如三本通史尽当时条件之可能地提供了一些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史料，即1986年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1989年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和1995年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又比如一些纪实性的作品也提供了可供继续研究的资料，如《历史在这里沉思》系列等。

51 江沛著：《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

52 这些文章大都分布在党史性质的通书里，一如既往地偏离历史真相，比如在说到“造反派”时，冠以“新红卫兵”的名称，并说“老红卫兵奉行‘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动手’；那么，‘新红卫兵’造反的形式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如果说老红卫兵的造反及其矛头所向有一点自发性的话；那么，新红卫兵斗争方向则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指使，他们自身也已完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造反工具。”张文和、李艳：《口号与中国》，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页407。

53 这十本书包括三本带有学术性的著作和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口述历史系列。三本带有学术性的著作分别是《红卫兵这一代》（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聚焦红卫兵》（200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和《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口述史系列则是《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这个系列已经出到了第七本，米先生打算出到十一本。

54 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页18—19。

55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92。

56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171。

57 纵观《文化革命简析》全文只有一处用了“老红卫兵”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国凯如主流一般将老红卫兵等同于红卫兵，恰恰相反，刘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老红卫兵的本质。见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124。

58 在重印的《文化革命简析》中刘国凯将“革命派”红卫兵全部改成了“平民派”红卫兵。见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后记、出版后记、两点说明》，2006年，http://blog.boxun.com/hero/liugk/89_2.shtml，2017年5月26日。

59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106。

60 陈佩华坦承社会冲突论的观点是偏向造反派的。因为七十年代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大部分逃到香港的红卫兵都是造反派，其中很大比例的人曾被下放农村，他们感到幻灭和不满，当时难以接触到保守派红卫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阶级成分较好，个人的处境比造反派好很多。见陈佩华：《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61 西方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又译为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曾经不无幽默的说道：“我们原来认为是三年，不过为了与你们国内的口径一致，而且也为了我们的书能在中国更好地销售，我们把它改成了十年。”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文化出版中心，2008年，页793。

62 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1年，页138—140。

63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王希哲：《希哲的文革观前后几乎相反吗？》2006年7月18日，<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15658>，2017年5月26日；

王希哲：《“人民文革”简要问答》，2006年6月19日，<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190005.shtml>，2017年5月26日。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2006年1月6日，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49391，2017年5月26日。

64 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2006年1月6日，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49391，2017年5月26日。

65 王希哲：《“人民文革”简要问答》，2006年6月19日，<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190005.shtml>，2017年5月26日。

66 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1年，页108。

67 为了便于与王希哲的人民文革作区别，突出现今的“人民文革论”的实质，本文特用“三年人民文革论”，所谓的“两个文革”其实主要着力点在“三年人民文革论”上。

68 徐友渔说这场争论是文革研究中所引起争议是最集中、最激烈的。见宋永毅编：《历史的真相与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社，第9页。及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年10月19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2.html>，2017年5月28日。

69 前文所述刘国凯和王希哲也转向了“人民文革论”，尤其是刘国凯，他于1996年撰文《三年文革与两条线》时，他是持“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的观点，并没有应和当时已颇有影响力的人民文革论。但是到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他却出版了一套《人民文革》系列丛书，并称“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研究者，刘国凯和王希哲都已无多大的影响力了，故不在此赘述。

70 郑义曾屡次提及他于八十年代后期在《作家》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首提“两个文革”的观点，但是笔者查遍1985—1990年的《作家》月刊，只登载有一篇郑义的文

章，即《永恒的流浪》，里面未提及“两个文革”或类似的说法，倒是提到知青时代使他生出异端想法。见郑义：《永恒的流浪》，《作家》月刊，1988年第5期。及郑义：《两个文革刍议：仅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罹难者》，《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996年第83期，<http://www.cnd.org/HXWZ/ZK96/zk83.hz8.html>，2017年5月29日。

71 郑义：《逃亡生涯勾起了一段回忆》，香港，《九十年代》，1992年第6期。

72 郑义的原话是：“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合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转引自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四大广场》第6期，1996年3月5日，<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2017年5月29日。

73 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1993年，页181—182。

74 郑义的原文是：“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权力结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旁落大权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见郑义：《两个文革刍议：仅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罹难者》，《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996年4月16日第83期，<http://www.cnd.org/HXWZ/ZK96/zk83.hz8.html>，2017年5月29日。

75 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之际，郑义谈到“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时，这样说到：“我所谓‘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的提法，不过是提请注意文革中人民反抗暴政之因素，不可跟在人家屁股后鹦鹉学舌式地‘彻底否定’。控诉‘造反派’暴行我也竭诚拥护，但请不要虚指，最好附上那个‘造反派’的组织名称。这样一来，人们一查，多半会发现那原是‘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可作会心一笑。说白了，用最极端的话来讲，各地大杀‘地富反坏右’的，不都是‘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吗？”参见郑义：《在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2016年5月18日，<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53595>，2017年5月29日。

76 参见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998年12月3日，第160期，<http://www.cnd.org/HXWZ/ZK98/zk160.hz8.html>，2017年5月30日。

77 据宋永毅说此文也被转载到了1986年的《中国之春》上。见习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知识份子》，1986年第3期。

78 转引自陈佩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79 杨小凯称《牛鬼蛇神录》在分篇发表时未经他的同意就删改了很多内容。参见杨小凯著：《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言页7—9。

80 罗金龙、郑文龙主编：《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3月，页273—287。

81 陈佩华：《摒除对红卫兵运动的歧见——重新检讨文革派性根源和文革分期问题》，《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1993年6月第四卷第六期。

82 陈佩华：《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83 为北师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之子，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参见田延：《“群众政治”还是“公民政治”？——评童小溪〈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2017年4月4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4-04/134445.html#SOHUCS>，2017年5月30日。

84 比如萧喜东说：“‘两个文革’论和一元化的‘彻底否定’的主流观点比较起来，注意到了精英之外的群众和群众政治，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也深受主流观点的影响，在一定

意义上，它是对主流观点的妥协；实际上主流观点形成的过程，也是“两个文革”论形成的过程。”参见转引自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龙、郑文龙主编：

《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3月，页138。

85 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四大广场》第6期，1996年3月5日，<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2017年5月31日。

86 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四大广场》第6期，1996年3月5日，<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2017年5月31日。

87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龙、郑文龙主编：《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3月，页161—162。

88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2001年8月2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5.html>，2017年5月31日。

89 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0 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1 此话系转，或许不够准确。

92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年在《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html>，2017年6月1日。

93 徐友渔著：《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精神生成语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页307。

94 这五个方面分别是：1、对派别斗争过程不清楚，一开始是老红卫兵一统天下，造反派是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才出现，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并未被派性所困扰；2、完全不知道派别的分化与发展情况，在大多数地方，66年底67年初保守派基本都被打散了，派系斗争在66年以后其实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3、对学生派别归属原因误解，大学里的红卫兵分派就不是以“血统论”为主；4、不知道两派分野的焦点，两派焦点其实是工作组；

5、对派别和后台的关系不清楚，军队不可能违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志站在保守派一边，只能在造反派的不同派系之间进行选择，周恩来也是这样，尽管他们或许更倾向保守派。在我看来，徐友渔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有道理，在某些方面则是属于对社会冲突论的一种误读。参见徐友渔著：《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精神生成语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页307—310。

95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徐有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公法评论》2002年2月6日，<http://www.gongfa.com/xuyywengejianjie.htm>，2017年6月2日。

96 这个变化或许跟董国强与魏昂德的合作有些关系。

97 董国强：《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1068.pdf>，2017年6月2日。

98 董国强：《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红卫兵运动》，《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总第126期。

99 参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3。

100 原上海中学的学生造反派，1989年出国，1995年开始以图书馆馆员的身份研究文革，因其在整理出版文革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史料上贡献极大而闻名于世。他于1997年出版的第一本研究著作《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即是一本文革史料的汇编。这本书的底本是他在文革中编辑的一本名为《思潮集》的油印文集，宋出国时将这本文集带

出。在2015年又以《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上下两册）之名由明镜出版社制成网络电子书出版。《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是他最新的最新成果。参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后记，《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专题），<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7/220/20031215170312.htm>，2017年6月3日。

101 宋永毅：《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102 不过，据笔者与吴一庆教授的所谈，吴一庆教授是不赞成“人民文革论”的，这也算是宋永毅先生仍不赞成“人民文革论”的一个曲笔吧。参见宋永毅：《从边缘层反思文革和文革后的中国——读吴一庆的〈边缘层的文革：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动向》，2015年3月号。

103 宋永毅：《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104 据笔者所见，印红标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唯一一次表态是在2015年年初的复旦大学“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上，当一位老师断然否定“两个文革论”时，印红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

105 在1990年以前，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观点还基本是官方的，即把红卫兵运动看成一个整体，以时间段来划分，不过，也稍微有了点以派系研究的影响。直到92年的时候，印红标才彻底的转向以派系研究的观点。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1卷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页831—874。

106 印红标：《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记忆》，2014年5月31日第114期。

107 印红标：《如不彻底反思群众还会用文革方式解决矛盾》，《凤凰网历史》，2014年4月6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duihuayinhongbiao2/detail_2014_04/08/35570682_0.shtml，2017年6月4日。

108 不过，董国强认为印红标在1992年论述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流派时，老红卫兵其实很像保守派。董国强：《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1068.pdf>，2017年6月2日。

109 在《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印红标也有个类似的定义，不过，我觉得他1997年文章的定义更加完整，故而采纳1997年的定义。见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页；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110 王友琴：《寻找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2003年九月号。

111 高伐林：《大规模迫害人、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王友琴博士答问录》，《多维时报》，2004年8月23日。

112 徐小棣编：《历史的义工——〈文革受难者〉书评文集》，电子文稿，页48。

11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页148。

114 王友琴、周志兴：《从普通受难者的角度来书写和反思文革》，共识网，2013年8月5日，http://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13_08_05.pdf，2017年6月4日。

115 王龙（杜钧福）：《读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说的文章》，2014年9月2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2v27t.html，2017年6月5日。

- 1 1 6 周伦佐：《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记忆》，2009年2月第五期（总第十五期），2009年2月21日，
<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No-15-2009%E5%B9%B42%E6%9C%8821%E6%97%A5.pdf>，2017年6月5日。
- 1 1 7 聂树人：《“老红卫兵”是造反派吗？》，2014年7月23日，
<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9954>，2017年6月5日。
- 1 1 8 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台北，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页183—217。
- 1 1 9 郭建的批评较为到位，但是他忽略了郑义和杨小凯所提出的人民文革论是划定了时间范围的，即1966—1969年。参见郭建：《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昨天》，2017年2月总第86期。
- 1 2 0 不过，中外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研究基本都以案例为主，从来就是“地方文革”研究。关于中国的“地方文革”研究思路，可参见金大陆、启之：《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金大陆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
- 1 2 1 联动成员邹建新曾在香港出书为联动“辩护”，但是观邹书不仅是重复了官方的既有论调，还带着浓浓的派性色彩，这个派性色彩是老红卫兵的。实难称得上研究。钟雪（邹建新）著：《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命抗争纪实》，香港联合出版社，2011年出版。
- 1 2 2 中文名韩惊，文革爆发时就读于101中，参加了文革，当时较为倾向于造反派观点，后回美国念书，母亲是史可（Bertha Sneck），她的圈子可能还是以当时的老红卫兵为主。有关她家庭的情况可参见王立礼：《我的美国老师史》，2012年6月29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50cbcd01011foa.html，2017年6月6日。
- 1 2 3 原名卜二华，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卜大华的弟弟。
- 1 2 4 卜伟华：《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一）》，2007年10月11日，
<http://bwh2006.bokee.com/18608287.html>，2017年6月11日。
- 1 2 5 这种沉默恐怕并不是王绍光所说的不能或不愿意说，而是不想说。
- 1 2 6 我不认为文革后的标准就一定胜过文革中的标准，因为派性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就消失，从很多回忆文章都可以看出，不管是保守派的成员还是造反派的成员都带着各自浓厚的派性，如果把“造反”的标签安在保守派身上，那保守派的成员是不会接受的，同理，“保守”的标签放到造反派身上，造反派也不会接受。
- 1 2 7 家庭出身代码（标准号GB4765—1984）中标出的是“干部”，但是这个标准制订于1984年还不大能反应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公安部科技局编：《公安信息化标准汇编：国家标准部分（1）》，中国标准出版社，2001年12月，页642—643。
- 1 2 8 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6月起，取消了军衔制，将军官薪金制改为国家干部工资制，这样军队干部才基本和国家干部对等起来
- 1 2 9 毛泽东时代红五类中的红三类。
- 1 3 0 吴洵、妮娜等编：《中国知青总纪实（上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页210。
- 1 3 1 刘堃主编：《实验回忆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9月，页260。
- 1 3 2 据说王绍光的父亲是原武汉市公安局局长。
- 1 3 3 王绍光：《文革“故事”从何说起？兼答陈佩华的批评》，《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 1 3 4 北京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 135 马鼎盛著：《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1月，第48页。又可参见马鼎盛著：《蒙胧的年代》，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页55—56。
- 136 王友琴此文发表于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后收入2001年1月出版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王友琴：《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香港，《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
- 137 印红标也认为“文革以前，高级干部通常指十三级（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参见吴洵、妮娜等编：《中国知青总纪实（上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页210。又见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63。
- 138 宋永毅主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1966年8月21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4（第三版）。
- 139 宋永毅主编：《刘志坚接见北京工业学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1966年8月19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4（第三版）。
- 140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座》，内部出版，1987年8月，页173。
- 14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八十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页127。
- 142 方广胜著；方新阳修订：《红卫兵长征日记》，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年10月，页220。
- 143 时为哈军工的大学生。
- 144 刘力：《1967年：上方山云水洞之游（全）》，2013年11月1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b16c240101010950.html，2017年6月11日。
- 145 陈闯创对此有不错但稍嫌过短的论述，参见陈闯创：《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昨天》，2015年3月30日第48期。
- 146 方迪的文章在此论述颇足。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8年6月30日第六五四期，<http://www.cnd.org/CR/ZK08/cr486.gb.html>，2017年6月11日。
- 147 米鹤都曾有类似的分法，他称老红卫兵“也包含两个派别，即支持‘对联’的一派和反对‘对联’的一派。他们基本上都参与了红八月的‘破四旧’，但是在行为方式上略有不同。我们姑且把其称为老兵中的激进派和策略派。但是，由于策略派的红卫兵组织数量很少，因此在一般研究中对这一区别略而不谈。”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页250。
- 148 此处不宜用派，因为这两部分红卫兵虽然摩擦矛盾不小，但始终没有发展成类似于保守派与造反派那样的矛盾，故而此处不用派更好。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